



Z42  
1  
:2

#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

## 经 济 学

下 册

主 编 宋 涛

副主编 卫兴华 顾学荣

庄次彭 陈益寿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 · 2005

# 财政学研究

(Finance, Studies of)

财政学是研究国家财政分配关系和分配管理规律的科学，是从国家财政分配活动的实践中总结、归纳、提炼出来的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基本原理，是国家理财的学问。

20世纪是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纪。该世纪的中国财政学循着社会历史演变的轨迹，在总结实践经验，继承我国传统优秀理财思想和有选择地借鉴国外财政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

长期以来，封建主义传统财政思想在我国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直到19世纪后半期仍然占有相当的市场。从20世纪开始，客观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得封建主义传统财政思想逐渐被冷落，西方财政学则日益流传开来。从20世纪开始到“五四”运动前夕的20年间，翻译的国外财政学著作和国人自撰的介绍西方财政理论的书籍愈来愈多，一些谈论财政问题的学者亦能直接从西方财政学著述中系统地吸收其思想。从1902年在我国首次出现以“财政”命名的专著起，到“五四”以前已有10余部财政书籍问世。这些著作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财政学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由于深受西方财政理论的影响，我国财政学的逻辑体系、表达方式以及名词术语等与在此之前相比，几乎完全换了一个面貌。

“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30年间的中国财政学，基本内容是更加系统地引进西方财政学说，并以其为理论准则来分析和评议各种现实财政问题。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主要论著有：寿景伟的《财政论要》（1926，二版），金国珍的《中国财政

论》（1931），陈启修的《财政学总论》（1935，三版），尹文敬的《财政学》（1935，三版），何廉、李锐合著的《财政学》（1935），千家驹的《新财政学大纲》（1949）等。这一时期财政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其一，缺乏独创性。以著名学者何廉、李锐合著的《财政学》为例，该书尽管被誉为中国人撰写并公开出版的第一部权威性财政学著作，然而其理论体系、结构框架基本是30年代前西方资本主义财政学的模式。其二，研究领域较窄，研究内容多为租税、公债、官产官业收入等，较少论及财政支出、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割据分裂和内外战争的动乱局面，加上基本国情的不同，资产阶级财政理论不可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实践产生多大的现实影响，中国财政也不可能走上西方财政体制的运行轨道。

新中国成立后，新兴的财政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下，立足于财政工作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50年代中国财政学的形成时期** 当时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都是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深受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苏联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是一种货币关系体系，他们建立起以货币关系为依据的财政学体系。这一时期中国财政学基本上沿袭苏联财政学，也以货币关系为依据来研究财政问题。50年代中期，我国一些财政学者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研究本国实践的基础上建立有本国特色的财政学，提出“国家分配论”的论点。认为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以国家为主体，对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进行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所形成的分配关系，并以此为依据构建中国社会主义财政学体系。但总的看来，当时还未形成以总结我国实践经验为主的系

统的财政学。

第二阶段，60年代中国财政学的建设时期 “一五”时期财政经济的成功经验和“大跃进”后的经济调整，都为财政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资料。在此基础上，以总结中国财政实践为基本线索的财政学体系开始形成。这一时期财政学研究的主要焦点集中在社会主义财政的本质、职能、范围、地位、作用，以及财政学的研究对象等基础理论问题上，并在学术界形成了“国家分配论”、“货币关系论”、“价值分配论”、“国家资金运动论”、“剩余产品分配论”等不同的学术观点及相应的学术流派。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中国财政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9年经济体制改革之后。

第三阶段，从1979年至90年代初，中国财政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市场化取向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经济实践对财政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国家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学术研究空前繁荣。中国财政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第一，以专著、教材、论文等形式对一些原有的学术观点进行了更加深入丰富的论述，提高了财政学体系的水平。同时，学术观点不断增多，在原有的观点之外，又产生了“社会共同需要论”、“再生产前提论”等新的观点。第二，研究的目的逐步从服务于阶级斗争转向了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三，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拓展。建立了以“收入、支出、平衡和管理”为基本框架的理论体系，并将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财政分配效益、财政发展战略等也纳入了财政学研究的范围。第四，研究思路有了突破。从强调研究财政与国家的本质联系、强调财政的社会属性的思路，发展为既研究财政与国家的本质联系，又研究财

政与再生产的内在联系的新思路，并以此为线索，探讨财政分配关系的各个方面及财政分配的规律性。第五，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化。从传统的定性研究和规范研究为主的方法论体系，发展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的更为全面的方法论体系，并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现代科学理论融于财政学研究之中，使财政学的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完善。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财政的本质、职能、范围和研究对象等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又有了一步的发展，形成了若干学派。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在财政学界影响比较大的学派，主要是“国家分配论”学派和“社会共同需要论”学派。

“国家分配论”的观点如前所述，在50年代中期已提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经过财政学界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国家分配论”不断地得到充实和发展。“国家分配论”学者认为财政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学者对“国家分配论”从理论上又做出一些新的论证。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有的学者提出建立科学的“广义财政学”论点；有的学者认为应“发展国家分配论，形成社会化分配理论”，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形势；还有的学者认为，不能把财政分配的特征局限于无偿分配、产品分配和直接分配；还有的学者提出新时期财政分配本质中还包含着经营管理，财政分配主体除国家外还应考虑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以及国家与集体、个人等各方面的关系，在财政的宏观调控中应研究计划与市场的结合运用，财政分配的目的也不应限于国家职能的实现，还应满足社会职能的需要；有人则强调，在

分析财政本质问题时，除说明其分配特征外，不能忽视财政作为国家管理经济活动的方面。

“社会共同需要论”在80年代初提出，其后许多学者从更广泛更具体的角度对这一论点进行了论述。“社会共同需要论”学者认为财政的本质是社会为满足共同需要而进行分配所发生的分配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原始社会财政发展到阶级财政阶段是财政史的一次根本性转折，从此在财政分配活动中充满了阶级斗争，表现出鲜明的阶级性，表现出与原始社会财政的本质区别。有的学者认为，按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需要就是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因此共同需要本身就已经直接表现为共同体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不是仅仅作为为达到目的而对劳动或劳动产品消费的需要。有的学者认为与社会共同事务相比，社会共同需要具有社会集中性、外部性、非市场化、客观性和历史性等特征。

除上述两大学派之外，在财政学的基本问题上，还提出许多各具特色的论点。一种论点认为，国家财政的产生不是由国家决定的，而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结果；一种论点认为，在从资源配置的角度重新认识财政，是当前重新认识财政概念的基本立足点；另一种论点认为，历史上存在的以原始氏族、部落、公社等的权力中心为主体的财政和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财政，体现着本质的区别；还有一种论点认为，财政是以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财政分配的目的是满足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生活和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所谓“共同需要”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个借口。也有一种论点认为，财政是带有阶级性的公共融资，它兼有阶级性和公共性；另一种论点认为，财政是社会单位的行政组织为实现其利益和职能而发生的

财富的取得、储藏、分配、使用和管理等有关的事务，等等。

第四阶段，90年代初至今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具体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由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点，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次重大的转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重构适应其要求的财政学体系成为当务之急。80年代以来形成的财政理论界的百家争鸣，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创造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条件。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全新的事业，这就给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的财政学建设带来了新的要求。理论界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学的重构，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财政本质、财政职能及其作用范围的界定、理财观念、宏观财政调控体系、财政运行机制、财政体制等重点课题的研究，打开了理论更新的视野。

(2) 结合市场经济改革的要求，提出了不少新的财政研究领域，如产权制度、财政投融资体系、经济周期和财政波动、财政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社会保障制度等。

(3) 出现了一批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主线，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并努力吸取西方财政理论精髓的财政学新专著。同时对税收、预算、公债、国有资产管理等一些重要的财政问题也以专著、教材、论文等形式，进行了较广泛深入的研究。

20世纪末的中国财政学，又重新出现了对西方财政理论全方位学习与吸收的趋势，从形式上看这似乎像是20世纪初中国财政学的一种回潮，但这时的中国财政学已经有

了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探索经验的积累，有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依托、研究和借鉴西方财政学的更坚定、自信的立场和更为明确的方向。有理由相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学必将逐步建立起来，并充分发挥其对社会主义财政实践的积极指导作用。

### 参考文献

陈启修：《财政学总论》，上海：商务印书馆，三版，1935。

何廉、李锐：《财政学》，上海：国立编译馆，十一年版，1948。

丁方、罗毅：《新财政学教程》，北京：十月出版社，1951。

陈共、侯梦蟾：《财政学讲义》（讨论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

许毅、陈宝森主编：《财政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

姜维壮：《当代财政学主要论点》，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何振一：《理论财政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王绍飞：《改革财政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陈共：《财政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姜维壮、李俊生：《当代财政学主要论点》（续篇），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童伟 林向阳）

### 财政的本质和职能研究 (Nature and Function of Finance, Studies of)

对财政本质和职能问题的较广泛深入的理论探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逐步开展起来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也不断深入，理论观点上的发展和争论也较多，一种较有代表

性的论点，认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简称“国家分配论”。持这一论点的学者在具体表述上也不尽相同，一种有代表性的表述是：社会主义财政是社会主义国家为维护、加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为建立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实现以最少劳动消费取得最大经济效益，不断满足人民需要，对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进行的有计划的分配和再分配。（见许毅、陈宝森主编《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强调作为财政本质的分配关系的特征，认为我国财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并以其为主体无偿地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分配所形成的分配关系，简称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或财政分配关系。（邓子基，见《财政学问题讨论集》上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5）在财政本质问题上的另一种有较大代表性的论点，认为财政的本质是社会为满足公共需要而进行分配所发生的分配关系，简称“公共分配论”或“公共需要论”。对这一论点有代表性的表述是，认为财政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结果，是由于出现了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之后，发生了社会共同需要而产生的。它的实质是人们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对剩余产品进行分配所产生的分配关系。（见何振一《财政起源刍议》，《财贸经济》1982.8）这一论点与“国家分配论”的主要区别点是，认为国家与财政的关系并不是国家创造了阶级财政，而是阶级财政的初步形成，为国家的产生提供了经济条件。（见何振一《理论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除上述两种有较大代表性的论点外，还有一些有相当影响的论点，主要有：认为财政的本质是货币关系或货币关系体系，简称“货币关系论”；另一种论点认为财政的本质是国家以价值形式进行社会产

品分配所形成的分配关系，简称“价值分配论”；还有一种论点认为财政的本质是国家资金运动所形成的经济关系，简称“国家资金运动论”；也有的经济学者强调财政的本质特征是对剩余产品的分配，简称“剩余产品分配论”。（见姜维壮主编《当代财政学主要论点》，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财政职能是财政作为一种特种分配关系在被运用于实现国家职能的实践过程所表现出的其本身所固有的功能。我国建国以来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适应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对财政职能的理论表述也有所发展。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有代表性的论点认为我国财政具有分配和监督两项职能。（见《财政基础知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4；曲兴业《财政学问题讨论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5）；也有认为财政只有一项分配职能的论点。（见许方元《社会主义财政本质职能和作用的探讨》，载《财政》月刊，1980.12）

执行改革开放方针以来，特别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政府职能转变的政策要求，对财政职能的探讨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论点上的争论更加活跃，有代表性的论点，按提出的职能数量归纳，主要有两大类，在同一类论点之内又有几种不同的表述。根据1985年以来出版的财政学和财政理论文献，一类有较大代表性的论点认为，当前我国财政发挥三项职能，其中一种论点认为财政的三项职能是分配、调节经济、监督管理（见何盛明、梁尚敏主编《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或者表述为分配、调节、监督职能（见赵春新《社会主义财政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在有的财政学著作中根据政府职能的转变，参考国外的提法，提出当前我国财政具有资源配置、收

入分配、稳定和发展经济三项职能。（见陈共主编《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另一种有相当代表性的论点认为，当前我国财政发挥四项职能，即筹集资金、运用资金、调节经济、反映监督。（见《社会主义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或者表述为：分配职能、资源配置职能、宏观调控职能、监督职能。（见赵雪恒主编《财政金融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 参考文献

姜维壮主编：《当代财政学主要论点》，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姜维壮、李俊生主编：《当代财政学主要论点》（续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项怀诚主编：《当代中国经济大辞库（财政卷）》，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童伟）

#### 财政管理体制研究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System, Studies of)

财政管理体制是国家财政的一项重要的或基本的管理制度，它规定着中央与地方政权之间，地方政权上下级之间，国家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之间的财政管理权限和资金支配权。这是我国当前一种有较大代表性的论点。持这一论点的经济学者在具体论述上又有所不同。如认为财政管理体制是国家划分各级政权之间，国家与企业、事业单位之间，在财政管理方面的职责和财政资金分配和管理权限的基本财政管理制度。又如认为财政管理体制是财政管理的一项根本制度，属于上层建筑，它是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资金分配权和管理权上反映着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关于财政管理体制的概念，还有两种不同的有代表性的论点。一种论点认为财政管

理体制是一种规则体系或组织管理体系。持这一论点的经济学者又有两种不同表述：一是认为财政管理体制是按照一定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组织和管理财政活动、协调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制度和规则体系，它是财政活动的组织和管理方式，这种组织和管理形式反映和体现了参与财政活动的各个方面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二是认为财政管理体制是国家财政分配的收支划分、资金管理权限确定、组织管理体系的总称。它是整个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体制一样，财政管理体制也属于上层建筑。另一种观点认为，财政管理体制是指国家、集体（包括企业、组织和部门）和个人分配剩余产品具体形式，体现各个财政主体的权力和利益的相互关系及运行规则。

除此以外，我国学术界对关于财政管理体制理论认识方面的论点，还包括财政管理体制的范围和财政管理体制的原则等方面的问题。

关于财政管理体制的范围，主要有两种有代表性的不同论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由四部分构成，具体表述为：社会主义财政分配关系从内容上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所以，协调社会主义财政分配关系的财政体制也就包括国家预算管理体制、税收体制、财务体制和投资管理体制。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由五部分构成，具体表述为：作为国家财政责权划分及其组成体系的财政管理体制，按照财政业务的内容划分，由预算管理体制、税收管理体制、投资管理体制、国营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和行政事业财务管理体制构成。这种观点的另一种表述是：我国财政管理体制从对象上分，通常包括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管理体制，国家与国有企业的财政管理体制和国家与行

政事业单位的财政管理体制三个方面；从内容上分，通常包括预算管理体制、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体制、流动资金供给管理体制和税收管理体制等若干方面。

关于财政管理体制的原则，主要有两种有代表性的不同论点。一种论点认为，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统一领导，是指在全国范围内，有统一的财政方针、政策，统一的计划和规章制度；分级管理，则体现各级地方政权机关管理本级财政收支的权力和责任。另一种论点认为，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必须坚持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原则；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与经济、政治体制相一致的原则。

建国以来，我国实行过三种不同类型的财政管理体制：(1) 统收统支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全国财政的主要收入均须上交中央，没有中央拨付命令不得动用；地方的一切开支均需经中央核准，统一按月拨付；预算管理权限集中于中央，包括税收制度、人员编制、工资和供给标准、预决算和审计会计制度，统一由中央制定、编制和执行；留给地方少许财力以解决临时性需要。我国1950年至1952年实行这种财政体制。(2)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这是一种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建立的财政体制，基本特点为：在中央统一立法权、统一执行权、统一计划、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的前提下，按照国家行政区划分预算级次，实行分级管理，原则上是一级政权一级预算；按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并按照企事业、行政单位的隶属关系确定各级预算的支出范围；主要税种的立法权、税率调整权和减免权集中于中央，实行纵向平衡。在这种体制下，地方预算的收支支配权和管理权相对较小，并

不构成一级独立的预算主体。我国从1953年到1993年间实行的基本上属于这种财政体制类型。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我国实行了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如1980年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1985年实行的“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1988年实行的多种形式的包干体制等。但这些改革和调整都没有从根本上突破“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模式。它只是在统一领导、划分收支的基础上，实现分级包干、自求平衡的一种财政体制。(3)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这种财政体制是指在明确各级政府职能范围和支出责任的前提下，以分税制的方法划分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同时实行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以平衡地方政府收支的财政体制。我国于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

#### 参考文献

- 姜维壮主编：《当代财政学主要论点》，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 姜维壮、李俊生主编：《当代财政学主要论点》（续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 陈共：《财政学》（修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 安体富、周生业：《财政与金融》（修订本），武汉大学出版社，二版，1996。

（牟 放）

## 会计学研究 (Accounting, Studies of)

20世纪中国会计学研究的发展与成就，可以概括为三次重大的会计理论创新。即20世纪初借贷记账法传入中国，建国后苏联模式会计核算理论、方法的引入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会计改革。

### 一、借贷记账法的传入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封建制度逐渐瓦解，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由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出现，旧式的中国簿记方法已不能满足核算和管理的需要。这时，一些进步人士看到，要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必须对会计进行改革与改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

在改革与改良会计的过程中，一位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是蔡锡勇。蔡锡勇，字毅若，福建龙溪人，青年时曾留学日本，后来又出使过美国和秘鲁等国，其借贷记账法的知识就是在留学与出使过程中学到的。对比中国旧式的簿记方法，蔡锡勇看到借贷记账法的很多优点，促使其产生了吸取西式簿记优点，改良中式簿记的想法。在翻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他写成了中国会计史上第一部介绍借贷记账法的著作《连环账谱》，并于1905年出版。该书分上、下两册，结合中国传统簿记方法对复式簿记进行了说明，包括账簿的设置以及记账规则的运用等。随后，在1907年，谢霖与孟森合编的《银行会计学》出版。1911年，孙德全的《理财考镜初稿》与《银行释义初稿》出版，这些介绍复式簿记著作的出版对中国会计工作和会计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就这样，我国会计界的先驱者们揭开了中国会计史上新的一幕，将借贷记账法传入了中国，带来了20世纪中国会计史上的一次理论创新。

认识到西式簿记的优点，加上一些进步人士对复式簿记著书立说，大力宣传，中国的企业逐渐抛弃了中式簿记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开始使用复式簿记，大清银行就是第一个推行复式簿记的先驱，尽管不久之后清政府的垮台使其改革流产，然而其改革尝试却是极其有意义的。

借贷记账法传入的历史意义在于，首先，它有利于封建经济关系的瓦解。其次，它促

进了中国金融企业会计、工业企业会计、商业企业会计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复式簿记思想的引入，对我国会计理论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工作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对于中华民国时期引进及运用国外先进的会计理论与方法，对于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出版事业的发展，对中华民国时期改良会计工作高潮的到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 二、苏联模式会计核算理论、方法的引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结束了革命战争年代，迎来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时期。建国初期，我国由于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采取了向苏联学习为主的做法，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作为经济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也就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高潮，会计界希望通过虚心的学习，解决一些中国的现实问题，如会计如何为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会计有什么特色，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需要，中国原有的会计理论与实务，哪些地方需要改变等等。

为了配合会计改革工作的进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3月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并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于3月9日发布了“关于草拟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训令。4月25日，财政部又根据“关于草拟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训令成立了会计制度审议委员会，负责会计制度审查标准的制定和具体审理的执行，为制定分行业的会计制度创造了条件。最早制定出部门会计制度的是重工业部。1950年4月，重工业部正式拟定《重工业部所属企业统一会计制度》，并于同年7月1日颁布实行。之后，其他部门也分别制定了部门会计制度并报财政部核定。这次改革形成了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套独特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

这次理论创新是与当时的经济政策分不开的，在计划经济下，需要统一的会计制度。借鉴苏联经验，拓宽了中国会计界的视野，也使中国的会计工作受到了普遍的注意。它在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会计改革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我国逐渐出现了一批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企业集团，这使得曾经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行业、分所有制、分部门的行业色彩极浓的一统到底的会计制度不再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反，倒成了经济发展的阻碍力量。而且由于我国的会计制度与国际惯例存在较大差异，这给吸引外资带来了麻烦，也给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因此国际交流的不断增加也要求会计进行再一次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呼唤中国会计的又一次理论创新。

这次至今尚未结束、影响极为深远和空前的会计改革，最初是在1979年底至1980年初于广东省举行的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上提出的，至今已经历时二十多年，其中有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1992年底颁布《企业会计准则》，该准则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中的基本准则。基本准则颁布后，财政部又加强了具体准则的制定，到现在已颁布了《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现金流量表》、《债务重组》、《建造合同》等八个具体会计准则。第二次高潮是1997年《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试行）》、《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的相继颁布与实施。第一次高潮实现了企业会计理论与实务的重大转变，形成了《会计法》统驭《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统驭分行业会计制度的一套新的会计体

系，加强了企业会计信息的可比性。第二次高潮实现了预算会计理论与实务体系的重大突破，重新划分了预算会计体系，形成了由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事业单位会计组成的预算会计体系。

这次改革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可以归纳为以下八点：

**会计目标的转变** 《企业会计准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试行）》都对会计目标作出了新的规定，如《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企业会计不再仅为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服务，而要同时满足企业内部管理和有关各方面的需要，《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试行）》要求事业会计要满足事业单位内部管理、预算管理和有关各方面的需要。

**会计假设地位改变** 会计假设在改革之前仅作为理论探讨过，其地位的真正确立是从《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试行）》的颁布开始的，这两个准则的明文规定使会计假设不仅确立了在会计概念体系中的地位，而且确立了其在法规组成中的地位。

**明确规定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 有些原则曾已纳入改革之前的法规体系，但不系统、不完整。《企业会计准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试行）》则结合国外经验，把会计核算的基本要求重新做出了较完整、准确的规定。尤其是《企业会计准则》中谨慎性原则的规定对于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对企业的稳健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会计要素的重新划分和确立** 《企业会计准则》把会计要素重新进行了划分，确立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六大会计要素。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试行）》则确立了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支出五大会计要素。

**会计报表体系的改革** 新的企业会计报

表由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财务状况变动表（现已改为现金流量表）和附表组成。预算会计报表则由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以及必要的附表组成，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与国际惯例的协调。

**记账方法的统一** 在改革之前，我国的会计方法相当混乱，除了借贷记账法，还有收付记账法和增减记账法，在同一行业中甚至也有记账方法不一致的现象。而新的企业会计和预算会计则统一采用借贷记账法，促进了会计核算的规范化。

**使用新的会计平衡公式** 改革之前，我国统一使用“资金占用=资金来源”这一平衡公式。在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这一经济内涵模糊的平衡公式已越来越不适用。所以企业会计改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预算会计改为“资产=负债+基金”这种新的平衡公式。

**改革资金管理制度** 国家对企业资金的直接监督、管理，转向了间接的宏观调控，企业的资金由专款专用变成了统筹运用。事业单位预算管理由原来的“全额、差额、自收自支”三种管理方式转变为“核定收支、定额或定项补助、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预算管理办法。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重大的成就，如企业会计成本核算方法的变化；事业单位预算内外资金实现统一核算；确立了权责发生制在预算会计中的应用等方面。

第三次会计理论创新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适应了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趋势，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次理论创新也为我国会计理论与实务今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对我国会计工作的积极影响和经济生活的积极影响正在不断显现出来。

## 参考文献

阎达五：《中国会计的第三次革命》，《财务与会计》，1993（3）。

阎达五、耿建新：《我国会计准则述评》，《会计研究》，1997（1）。

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下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杨时展：《1949～1992年中国会计制度的演进》，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赵英杰）

## 中式簿记之改革与改良研究（Reform and Improvement of Chinese Book-keeping, Studies of）

中式簿记是指以四柱为原理的中国旧式记账法。它是相对于西式簿记而言的。从宋朝官厅采用四柱清册后，便奠定了中国民间工商企业记账的理论基础。中式簿记缺乏专书记载，只凭口传心授，因此，各地习惯的记账格式并不完全一致。组织较严密的中式簿记，如龙门账、天地合账等，均为复式记账法。解放前，中国的绝大多数工商企业均采用这种记账方法。中式簿记有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一定的账簿组织、记账程序和规则，并能根据账簿编结成册。但由于中式簿记采用上下竖写的方式，数字不易计算，账户和账簿设置也不够严格，不如西式簿记（英、美式的记账方法，它是相对于中式簿记而言的）书写简便，容易查核，程序统一，单证齐全和组织严密。因此，在20世纪20～30年代，我国会计学界围绕着改革或改良中式簿记这一问题，逐步形成了两大学派，即以潘序伦先生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徐永祚先生为代表的改良派。

改良中式簿记派认为，他们所推行的改良中式簿记，其立足点是建立在中西会计之

优点结合基础之上的。中式会计之所以能长久存在，是因为它有四方面的长处：一是理论浅显，容易为初学者掌握；二是方法简便，易于会计人员操作；三是通俗易晓，比借贷原理明了；四是节省经费，且簿记人才容易物色。根据以上四点，改良中式簿记派作出如下结论：中式簿记并非全无组织和程序，其记账方法并非全不合理和不科学，因此，中式簿记不仅在形式上有维持之价值，而且在实质上，亦有保存之必要。但从探索改良的道路出发，改良中式簿记派又指出了中式簿记的弱点。他们认为，中式簿记的缺点不少，但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点：一是账户无一定之分类，二是账簿无一定之组织，三是账簿无一定之格式，四是账法无一定之规律。也正是这四种弊病之所在，便是改良中式簿记之必要。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改良中式簿记派又以中式簿记之短，对比西式簿记之长。他们认为，西式复式簿记具有最新之科学原理，其账户有一定之分类，账簿有一定之组织，账表有一定之格式等等，而这些都为中式簿记所不及，也正是引进他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之原因。为此，改良中式簿记派在改良大纲中确定，应以账户之分类，账簿之组织，账表之格式，以及记账之方法，为改良之重点。在具体进行改良的过程中，改良中式簿记派尤其注意强调两个方面：一方面再三阐明中式簿记符合东方人之观念，且具有长久的历史和强大的习惯势力，绝非西式簿记所能取而代之。并同时指出，西式簿记的理论有极为难懂之处，特别是对于“借”和“贷”二字的解释颇有牵强附会之嫌。故此断言西式簿记也有不如中式簿记之处；另一方面又明确提出了两项改良原则，即凡符合科学原理者，沿用之；凡与科学原理相背离者，改良之，而决不可迁就中式簿记之缺点。为防止改良之障碍，改良中式簿记派还专门指出应

克服闭关保守，不学西方之先进之科学的错误思想。

而当时的改革中式簿记派则认为，借贷簿记法是近代科学、完善而合理的一种记账方法，它的基本原理通行于世界各国，而且借贷复式簿记理论是最完备的簿记理论。据此他们提出通过全面引进借贷簿记理论及方法，建立我国的新式会计，以改革中国传统的旧式会计。他们指出，中式之收付簿记法，实难及世界一致采用之借贷簿记法为完善而合理。并针对这一点批评改良中式簿记派，认为改良中式簿记派绝对排斥借贷理论，而企图另立一种收付理论，并使它永久存在，这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为此，他们指出，仅仅通过改良中式簿记，达到与西式簿记永成对抗并立之势，是违背世界范围内科学统一之原则的。由此他们进一步指出，中式簿记中的收付理论最多只可以说是适用于消费机关的簿记理论，而不是工商企业的簿记理论。作为中国会计的改良，决不能简单地把适合于消费机关的簿记理论，搬到工商企业来。另外，改革派还明确指出，收付簿记法有不少致命的弱点，比如收付理论不一贯，收付形式相矛盾及收付事实相反等等。因而，他们断言收付簿记最终必将被借贷复式簿记所完全取代。改革派还以西式簿记理论为依据，对改良中式簿记派所建立的收付簿记理论进行了批评。他们认为，中式簿记的收付理论核心点有二：第一，把一切交易都看作是以现金为中心，所有资产、负债、资本的增减，都看作是现金价值的增减；第二，一切交易的记载，都是反映现金收付的原因与结果。在他们看来这正是收付簿记理论的缺点和矛盾所在，因为工商企业进行交易的时候，一切资产、负债、资本的账面价值，是进行价值，而非现金价值。现金价值是指即刻变为现金的价值，但这种价值却是清算价值了。所以

一切交易所影响于资产、负债、资本的价值，都不是现金价值，而是非现金价值。因此，明白了这一点，收付簿记理论的第二核心点便不攻自破。改革派还认为，簿记记载企业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记载企业的资产、负债、资本的变化，因此每一记载都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相关联。据此，他们指出，改良中式簿记派以为记载交易，是记载现金的来源与去路，这不能不说这是抹煞客观事实。紧接着改革派又针对改良中式簿记派施行改良的四大方法，即“收付簿记法”、“账簿分割法”、“统辖记账法”以及“四柱结算法”进行了具体批评。他们认为，改良后的中式簿记可以当作一个完整的会计理论去看，至少从整体上也可以说较之未改良前，已属完善得多。而且在实施的时候，或者也勉强可行。但是，如果站在一般会计学术的立场上，对于这个改良中式簿记中的收付理论，就会发现有许多根本不能容忍的地方。在进行全面的批评之后，他们认为，改良中式簿记似只能被认为是改良簿记运动中的一种过渡方法，而不可视为有学术上的价值，仅能视为小商号不得已之补救办法，而不可作为普遍应用之理论进行宣传。在改革派中，甚至还有更直截了当的说法，认为改良中式簿记不能适用为现在中式簿记走向完善合理的会计理论与方法的一个过程或阶梯。而且指出，就现在的状况及将来的趋势看来，世界通用的复式簿记一定能渐渐地适用到我国的整个企业界中去，如果有人要想严格地保持旧式或改良中式簿记，非但事实上所不可能，也是不必要做的一件事。因此，改革中式簿记派确信中国会计奋斗之目标，不是“改良中式簿记”，而是全面引进、推行借贷复式簿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发生的中式簿记之改革与改良之争是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会计学术讨论与交流，是我国老

一辈会计学家为振兴改进中国会计的落后状况而作出的重要努力，也是我国会计学术初步取得进展的主要标志。尽管两派观点对立，所走之路不相一致，然而他们都是抱着相互商讨、求同存异的态度来研究改进中国会计问题的，其出发点是相同的，他们既针对改进中国会计所存在的分歧进行激烈的争论，但彼此又相互尊重，以礼相待，不将己见强加于人，充分表现了我国老一辈会计学家良好的学风和高尚的品格。通过这两大学派之争，既有成功之经验传诸后世，又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影响于未来，他们对于改进中国会计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使两派在讨论改进中国会计问题中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片面性。借贷复式簿记是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它具有先进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在本质方面要优越于中式簿记，故中国会计之改进必须以引进借贷复式簿记的理论与方法为前提。改革派认为未来的绝大多数企业将会采用借贷复式簿记，这无疑是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看法。同时，他们对于引进推行新式簿记理论与方法也确实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改革派对中式簿记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甚至断言将来完全废除中式簿记，这种认识亦未免过于激进。而改良中式簿记派能够比较认真地总结中式簿记的优缺点，肯定了中式簿记方法体系中的可取之处，较好地处理了继承与改良的关系，这是应当加以肯定的。但改良中式簿记派过高地估价了中式簿记的长处，较低地估价了西式簿记的优越之处，过多地强调继承中式簿记的长处，而事实上将一些短处也保留下来。因此改良中式簿记派对中式簿记所进行的改良是不彻底的。

总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发生的这场中式簿记之改革与改良之争，把中国会计学术与会计实践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

期，改革派与改良派在这场运动中各自都有自己的贡献。相对而言，前者所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后者，后者的影响范围也远远不如前者，这已经被我国近半个多世纪的会计改革所证实。

### 参考文献

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海涅著，文硕等译：《会计史》，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

刘明辉：《走向21世纪的现代会计》，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陈 轩）

## 中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研究

(Harmonization between Chinese Accounting and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Convention, Studies of)

中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或协调集中表现在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上，其发展和深入的过程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息息相关，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会计在许多方面已与国际会计惯例一致起来。但各国具体情况始终存在差异，大的方面一致了，具体处理方法仍各有特点，旧的矛盾消失了，新的矛盾又产生，因此中国会计与国际惯例接轨研究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和过程。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步涌现出一批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企业集团，同时随着沪、深两地证券市场的建立，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部门、分行业、分所有制一统到底的会计制度明显地暴露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权限高度集中，企业被统得过死，难以走向市场；第二，分部门、分行业、分所有制的管理不适应混合经济实体的要求，

不利于宏观统一调控；第三，与国际通行惯例存在矛盾，不利于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给海外资金进入中国带来了麻烦，给中国企业海外发展也带来了不利影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会计学界早在1980年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上就酝酿对当时的中国会计制度进行改革。1987年中国会计学会成立了会计理论与会计准则研究组，1988年财政部会计司设置了会计准则课题组，成为专门主理会计准则方面事务的官方机构。1992年底《企业会计准则》正式颁布，财政部会计司开始协调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1997～1998年具体会计准则在全国范围内的讨论基本完成，截至1998年10月止已有8项具体会计准则公布，尚有20余项有待公布。1998年10月12日财政部会计司成立“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会由6名专家组成。自此中国会计准则已由制定阶段转为全面推广实施阶段。

国际会计惯例的内容，一般认为是一种已经形成、现在可以借鉴的惯例性作法。由于国际交往与合作的增多，各国特别是在国际经贸合作中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些普遍采用的会计做法和规则就是国际会计惯例。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在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总结起来国际会计惯例集中体现在如下方面：（1）会计要素：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的界定和计量；（2）会计基本假设：会计主体、会计分期、持续经营、货币计量等；（3）会计基本原则；（4）会计计账方法；（5）会计报表种类、格式、顺序、编制方法；（6）合并报表的概念及编制方法；（7）会计信息服务对象与会计内部控制制度。

从1980年算起，经过近二十年会计改革，中国会计制度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许多

多重大方面已基本与国际惯例接轨或协调一致：

1. 随着会计准则的颁布，我国会计核算已形成三层次的法规体系：第一层次是会计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订并以国家主席令的形式发布；第二层次是会计准则和大行业会计制度，由财政部制定，对所有经济组织的会计核算工作均有约束力；第三层次是由企业自行制定的仅对具体企业有约束力的会计规程。会计准则打破了行业、部门、所有制的限制，从会计主体的经营出发把覆盖面扩大到所有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以及一些准盈利单位，从而破除了50年代以来分行业、分部门、分所有制的宏观会计管理模式，大大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向国际会计惯例靠近了一大步。

2. 会计准则批判地吸收了国际上有共识的会计假设，从中选出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期间、货币计量四个假设，并将其作为组织会计工作的前提条件明文规定下来，这是我国第一次将会计假设纳入自己的会计法规体系中。

3. 在会计信息服务对象方面，会计准则将原会计理论中“满足国家作为管理者进行决策需要”扩展到既要满足国家宏观管理决策需要又要满足全社会根据会计信息了解企业财务状况的需要，还要兼顾企业内部决策需要。改变后的会计信息服务对象向国际惯例靠近了一大步。

4. 会计准则规定“会计记账应采用借贷复式记账法”，从而否定了增减记账法和收付记账法，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规范了会计核算制度。

5. 会计准则要求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核算时必须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制度，这不仅仅是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而且也是为了保证审计工作正常开展，这一点与

国际惯例取得了一致。

6. 会计准则规定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为会计六大要素，放弃了“资金占用”、“资金来源”等概念，与国际惯例协调起来。会计准则同时规定将资产、负债按流动性大小和时间长短在资产负债表两边列示，将所有者权益分为投资人投入资本、公积金、公益金和未分配利润四大块。这些变化充分体现了产权明晰化、为投资者服务的倾向，弱化了国家直接控制企业的职能，增强了企业的自主性。同时会计准则还采用了期间成本的概念，用营业收入的概念取代了销售收入的概念，从而使西方边际分析理论可以顺利移植到中国。

7. 会计准则使我国会计报表从几十年来一直沿用的“资金平衡表”、“成本费用表”、“利润表”的旧报表体系一步变更到“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财务状况变动表（或现金流量表）”的新报表体系，新报表体系的编制顺序和编制方法都基本与国际会计惯例一致起来。

但是，在会计准则中仍有中国特色：

1. 我国会计准则中将会计目的中首先列为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需要，其次才是满足有关方面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需要，满足企业内部经营管理需要。而国际惯例中并不强调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需要。这点差异产生的原因是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 会计准则中明确了会计的12条一般原则，基本遵循了国际惯例，但在如下方面仍有自己的特色：（1）国际会计惯例强调会计信息为投资决策服务的实用性，而中国更强调会计信息的合法性、真实性，强调会计信息为投资者和宏观管理者共同服务的双重特性。（2）国际会计惯例更强调会计信息的微观决策相关性，而中国会计准则则强调会

计信息的微观与宏观双重相关性。（3）稳健性原则在国际惯例中普遍采用，而中国会计准则虽将其列入“一般原则”，但在具体问题处理上只能有条件地使用。

3. 在资产计价方法和确认上，中国会计准则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短期证券投资期末计价通常有三种方式：市价法、成本法、成本与市价孰低法，国际通行做法认为可以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尤其对股票的期末计价要求采用此法，而中国会计准则规定必须采用成本法，对市价变动的影响可以用“括号”或“注释”的方式列示。另外，在存货发出计价、坏账准备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折旧、商誉计价、无形资产确定范围等方面，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惯例都有一定差异。

4. 在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方面，首先中国会计准则中尚未涉及或有负债问题，而国际上一般认为或有负债与流动负债、长期负债共同构成负债的整体。中国会计准则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放在长期负债中列示，而国际通行做法是将其转入流动负债中列示。其次，在中国业主权益被称为“所有者权益”，这是由于中国是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简单的“业主权益”无法准确涵括非个人的财产所有权。第三，在股利分配方面，国际通行做法是将留存收益拨向其他用途来限制股利发放，而这种限制一般来自公司的董事会，而中国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颁布财务制度来限制利润分配的。

5. 我国会计报表体系根据会计准则已基本与国际惯例接轨，但中国会计报表要采用前后两期对比方式填列，有计划或预算数的项目应同时填列计划或预算数。同时中国会计准则在合并报表编制范围上比国际惯例更注重“实质重于形式”的会计原则。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

入，中国会计制度已逐步向国际会计惯例靠拢，但由于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有些国际通行做法在中国不一定行得通，因此我国会计准则在对国际通行惯例的借鉴中采取了扬弃的办法，取其精华，结合本国国情尽可能协调一致，同时，某些方面则继续保持中国特色。

一般认为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可能完全一致，加之各国文化背景的差异，各国会计处理方式之间的协调将长期存在，因而中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的工作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 参考文献

中国会计学会：《中国会计学会重点科研课题文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王庆文、庄恩岳：《具体会计准则全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美国会计准则解释与运用》，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

沈小南、朱海林译：《国际会计准则——财务报表可比性》，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

（金永忠）

## 审计学研究

(Auditing, Studies of)

在我国，审计作为一项经济监督工作，源远流长。早在北宋时期，就出现了审计一词。但对审计理论的研究直到20世纪才开始。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会计、审计界就涌现出谢霖、潘序伦、徐永祚等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在他们的推动下，我国的民间审计事业得到了发展，并且著译荟萃，学说灿烂。许多审计理论研究的成果对后来的审计理论与实务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就潘序伦先生30年代所著的《审计学》一书而言，该书以资产

负债表审计为主线，实务与理论并重，论述了详细审计的原理和法则，除讲述审计的定义、目标、种类、内部控制等审计的基本理论问题外，还分别讲述了资产负债表各要素审查的要点及技术方法。书中众多30年代时的观点对于20世纪末的今天仍不失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恢复建立审计制度以来，随着审计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审计理论工作者和审计实务工作者，在审计理论建设方面付出了艰巨的努力。我国会计审计界人才辈出，百家争鸣，审计理论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审计理论研究在改革中发展和深化

早在1979年末，中国财政学会和中国会计学会便着眼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开始了恢复与建立审计制度的讨论。1984年中国审计学会成立以后，我国的审计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年来，审计科研机构和审计学会在深入研究审计基本理论问题的同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新形势，努力探索审计如何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一些课题研究和学术讨论大大促进了审计更好地发挥作用。归纳起来，我国审计理论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审计基本理论研究，包括审计性质、定义、职能、范围、目标、对象等概念研究以及审计理论结构等课题的研究，对审计的一些基本理论取得了较深入的认识。②审计组织体系和审计管理体制的研究，科学地界定了国家审计、内部审计和民间审计的关系以及国家审计管理体制等有关问题。③经济效益审计研究。1985年和1998年，中国审计学会两次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组织学术界进行经济效益审计的研究，讨论经济效益审计的概念、内涵、方式和方法等问题，积极探索审计为提高经济效益服务的